

社会信任水平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基于 CGSS 数据的经验证据

刘笑霞¹ 李明辉²



(1.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4;

2. 南京大学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 CGSS 调查数据以及中国沪深两市 A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 2008—2016 年数据, 研究了上市公司所在省份社会信任水平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结果发现: 社会信任水平与审计定价呈显著负向关系; 进一步研究表明, 盈余质量(以操控性应计的绝对值度量)、审计努力程度(以审计延迟度量)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这表明, 社会信任可以降低审计师对财务报表错报风险的评估水平, 降低审计师努力程度, 从而降低审计收费。研究还发现, 上市公司所在地区法治水平和市场化水平均可以弱化社会信任对审计定价的负向作用, 在法治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 社会信任的作用较弱, 而在法治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差地区, 社会信任对降低审计定价的作用更明显, 社会信任与法律制度、市场化水平之间均存在替代关系。这一研究, 可以加深对社会信任与审计师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解, 并可以进一步丰富社会信任的微观经济后果的文献。

关键词: 社会信任 审计定价 审计风险 审计努力程度

中图分类号: F23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5766(2019)10—0143—19

一、引言

Gambetta(2000)^[1]将信任定义为个体对于潜在对手实施对其有利或至少是无害行为概率的主观评价; Guiso 等(2008)^[2]则将信任定义为个体对其被欺骗概率的主观评价, 这一主观性概率部分地建立在影响舞弊发生的可能性的金融系统特征(比如投资者保护质量及其执行机制)的基础上。信任构成了社会资本的核心, 在契约不完备和存在潜在败德行为的情况下, 信任尤其重要(Pevzner 等, 2015^[3]; Hilary 和 Huang, 2015^[4])。作为正式法律与管制制度的替代物或补充, 信任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合作, 尤其是促进陌生人之间的合作(Williamson, 1993^[5]; La Porta 等, 1997^[6]; 福山, 2016^[7])。许多文献发现, 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对宏观经济发展和企业微观行为均具有显著影响(Knack 和 Keefer, 1997^[8]; La Porta 等, 1997^[6]; Zak 和 Knack, 2001^[9]; Guiso 等, 2004^[10], 2008^[2], 2009^[11]; Cline 和 Williamson, 2016^[12])。在财务与会计领域, 一些文献发现, 公司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会影响其会计信息质量(Pevzner 等, 2015^[3]; Jha, 2019^[13]; 雷宇, 2011^[14]; 黄宏斌, 2012^[15]; 张兴亮和夏成才, 2016^[16]; 刘宝华等, 2016^[17])。这意味着, 地区社会信任会影响到公司财务报表重

收稿日期: 2019-04-03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审计师对客户税收激进度的反应”(71602047);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企业党建对上市公司财务、会计行为的影响”(2017ZDIXM069)。

作者简介: 刘笑霞, 女, 教授, 研究领域为审计, 电子邮箱: xmulxx@126.com; 李明辉, 男,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为审计与公司治理, 电子邮箱: xdlmh@163.com。通讯作者: 李明辉。

大错报风险水平,进而影响审计师的审计风险。而外部投资者、债权人、监管者等利益相关者在做出信贷、投资、监管审批等决策时,也会考虑公司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Pevzner等,2015^[3];Hasan等,2017^[18];刘凤委等,2009^[19];戴亦一等,2014^[20]),由此推论,地区社会信任水平会影响到公司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此外,社会信任水平还会影响审计师对审计证据的获取及评价。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客户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将对审计师行为产生重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信任机制具有“连坐效应”和“固化效应”(张维迎,2001^[21];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22]),一旦某些地区由于某种特殊原因给人一种值得信任或不值得信任的印象,这种印象就会变成一种在短期内不会改变的“偏见”(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22]。因此,尽管同一地区不同主体间诚信水平存在差异,低社会信任水平地区也可能会有讲诚信的企业和管理层,但客户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还是会给审计师留下固化的印象,进而影响到其审计定价、业务承接等决策^①。Jha和Chen(2015)^[23]对美国公司的研究表明,审计师会对总部位于社会资本较高的县的客户收取更低的审计费用。

然而,中国的相关制度背景与美国有较大差异。一方面,总体上,在中国信任往往仅存在于熟人之间,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社会信任程度相对较低。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事实上也存在于海外华人社会中),存在以“己”为中心、通过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连接并由内向外逐渐减弱的波纹差序格局(费孝通,2008)^[24],人们只倾向于信任与自己有关系的人,而非非常不信任自己家族和亲属群体之外的人,家族之外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即社会信任程度很低(福山,2016)^[7]。另一方面,信任受到特定社会文化传统和社会构成的制约和影响,具有因时因地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李伟民和梁玉成,2002)^[25],个体、社区、社会诸因素都会影响社会信任水平(李涛等,2008)^[26],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如语言、儒家文化、宗教、族群等)不平衡,人口分布及流动性也存在较大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不同地区社会信任水平亦存在较大差异。就审计市场而言,中国审计市场是买方市场。在客户面前,审计师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对于中小事务所而言,激烈的市场竞争可能会使得他们饥不择食。实践中,中国上市公司审计费用一定程度上存在“固化”或“锁定”现象,表明审计师在价格谈判中实际上处于劣势。就法律制度与文化而言,中国传统的恶讼文化、证券法律制度“重行轻民”的特点,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审计师实际的法律风险(尤其是民事诉讼风险)并不像西方尤其是欧美国家那样突出,他们面临的主要是监管部门的处罚风险,这使得其决策行为可能与西方同行不同;另一方面,现有法律制度及公司内部治理机制难以为审计师勤勉、独立地执业提供充分保障,审计师利益在遭受客户侵害时,也难以求助于司法,这使得其与客户之间的相互信任变得更为重要。那么,在上述制度背景差异下,Jha和Chen(2015)^[23]的结论是否可以推及到中国?从现有文献来看,仅Chen等(2018)^[27]对此稍有涉及,而缺乏专门、深入的研究。因此,在中国,审计师在审计补偿(定价)决策过程中是否也会考虑客户所在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尚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实证的问题。本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相关调查数据衡量上市公司所在省份社会信任水平,进而研究其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

本文从如下方面进一步拓展了现有文献:(1)在Jha和Chen(2015)^[23]对美国公司研究的基础

① 由于审计决策过程的黑箱化,本文难以找到公司所在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影响审计定价等决策的直接案例。不过,在对某国内证券执业资格事务所合伙人的访谈中,其表示,对于某些可信任程度较低的省份,他们在业务承接、确定收费时,会特别慎重。此外,2018年1月8日,新三板挂牌公司英冠陶瓷(834972)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将其2017年度年报审计机构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更换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原因是“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东北地区不再接受审计业务”,后虽然更正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较为繁忙,且合同已经到期”,董秘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其对事务所的意思存在个人误解,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的真实意思只是“要加大对东北IPO企业的核查力度”,但这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一些事务所在做出相关决策时可能确实会关注地区因素,包括地区社会信任因素。

上,实证检验了中国制度背景下公司所在省份社会信任水平对审计定价的影响,进一步拓展了社会信任与审计师行为之间关系的文献,并从审计角度提供了社会信任微观经济后果的经验证据。(2)本文进一步研究了社会信任对审计定价的作用机理,并发现盈余质量和审计师努力程度具有部分中介效应。(3)本文还考察不同地区法治水平、市场化水平下,社会信任水平对审计定价作用的差异,发现社会信任与法治水平、市场化水平之间均表现为相互替代关系。这有助于理解,为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诉讼文化较为缺乏的国家中,审计师为何会关注社会信任,从而进一步拓展李明辉(2019)^[28]等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及评述

1. 现有相关文献回顾

(1)社会信任水平对公司信息披露的影响。Nanda和Wysocki(2013)^[29]对43个国家数据研究后发现,社会信任程度与公司盈余透明度、会计稳健性及年报披露呈正向关系;Jha(2019)^[13]发现,总部位于高社会资本地区的公司发生财务信息虚假陈述的可能性更低、操控性应计更低、年报可读性也更强。现有文献还发现,在社会信任较高地区,公司会计稳健性更高(张兴亮和夏成才,2016)^[16]、会计舞弊更少(黄宏斌,2012)^[15]、盈余的信息含量更高(Pevzner等,2015)^[3];雷宇,2011^[14]、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更低(刘宝华等,2016)^[17]。

(2)社会信任对公司审计需求及审计师行为的影响。雷光勇等(2014)^[30]发现,在高社会信任地区,公司更可能选择高质量审计师,其原因在于,高信任地区的大股东和管理层不担心高质量审计师的监督,这一结果与Chami和Fullenkamp(2002)^[31]、Hilary和Huang(2015)^[4]“信任水平与治理机制呈替代关系”的预期相反;而李明辉(2019)^[28]发现,在低社会信任地区,更容易发生审计师变更。Jha和Chen(2015)^[23]发现,审计师会对总部位于高社会资本地区的公司收取较低的审计费用。这表明,审计师会根据客户总部所在地区来判断其可信任程度,并对那些位于社会信任程度较低地区的公司收取审计溢价。Chen等(2018)^[27]发现,位于高社会信任地区的公司收到不清洁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更低,且上述关系在母公司任命的董事占比较高、母公司分支机构较少、企业与审计师事务所距离较近、母公司是国有企业或持有客户较多股份、客户操控性应计较高时更为明显。还有文献研究了社会信任对审计行为或其后果的调节作用(武恒光和郑方松,2017)^[32]。

此外,还有一些文献从企业层面研究企业诚信文化(姜付秀等,2015)^[33];耿艳丽和鲁桂华,2018^[34]或企业内部信任(Garrett等,2014)^[35]对会计信息质量、审计的影响。如Garrett等(2014)^[35]发现,组织内部员工对管理层的信任水平与更高的应计质量、更低的财务报告重述概率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概率相联系,但上述关系仅存在于相对分权的公司中。

2. 对现有文献的总结与评价

由上分析可以看到,已有一些学者研究了社会信任水平或与之相关的社会资本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Jha和Chen(2015)^[23]开拓性地研究并发现,社会资本会影响审计师对公司管理层的信任程度。但在我国,社会信任关系、审计市场发育程度、相关法律与监管制度均与美国有较大差异。此时,公司所在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是否会显著影响审计定价?如果社会信任对审计定价有显著影响的话,其内在机理(路径)是什么?这是本文试图探索的问题。

本文与Jha和Chen(2015)^[23]的差异主要在于:(1)制度背景的差异。Jha和Chen(2015)^[23]是基于美国审计师诉讼风险较高、社会信任水平总体较高的环境,而本文则是基于中国陌生人间的社会信任水平相对较低、买方审计市场、审计师民事诉讼风险较低的环境,能够提供中国特有制度背景下社会信任与审计定价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2)社会信任的度量不同。Jha和Chen(2015)^[23]是基于美国东北地区农村发展中心(NERCRD)数据,以总统选举投票率、普查回复率、社会和公民

协会的数量、非政府组织数量等四个指标来度量美国各个县的社会资本(他们认为,社会资本实际上就是共同信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到县域社会资本的度量,相对较为间接;而本文则是采用 CGSS 对社会信任相关问题的调查结果来衡量各个省份的社会信任水平,更为直接。(3)在社会信任对审计定价的影响路径上,Jha 和 Chen(2015)^[23]考察了社会资本对审计延迟、诉讼风险的影响,而本文则考察了会计信息质量、审计延迟的部分中介作用,能够更全面地揭示社会信任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机理。(4)考虑到正式制度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制度背景与美国的不同,本文还考察了地区法治环境、市场化水平的调节作用。

三、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根据 Simunic(1996)^[36]的基本模型,审计成本和风险溢价构成了审计定价的基本要素。客户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将同时从这两个方面影响审计定价:

1. 审计成本

社会信任水平会通过影响审计成本进而影响审计定价。其作用路径包括两个方面:

(1)审计努力程度。在社会信任水平高的地区,管理层在信息披露上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较低,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因而更高(Nanda 和 Wysocki,2013^[29];Pevzner 等,2015^[3];Jha,2019^[13];雷宇,2011^[14];刘宝华等,2016^[17]),财务报表中的重大错报风险较低。高社会信任地区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更高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由于社会范式的作用,高社会信任地区的个体更加注重遵守社会共同体内的行为准则,较少发生违反所在社区成员普遍接受行为准则的行为,他们也会预期该社区内的其他成员都遵守同一社会范式,正是这种预期,才导致了共同体内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从而提高了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福山(2016)^[7]将信任定义为“有规律、诚信、相互合作的共同体内部成员基于共同认可的准则对其他成员的期望”。这种社会范式的示范作用,将引导包括企业管理层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更加注重诚信、减少信息欺诈等行为。另一方面,高社会信任度地区更为发达的社会网络将极大地提高失信行为的成本,从而迫使该地区内个体更加注重诚信。因为,在发达的社会网络下,一旦某个个体发生失信行为,信息将很快在整个地区扩散开来,导致较多个体不愿意与之进行交易。就会计信息而言,高信任地区的高失信成本将迫使管理层更诚实守信(Chen 等,2018)^[27],减少隐瞒信息、提供虚假信息等机会主义行为。在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当审计师的可接受审计风险水平既定时,客户财务报表中的重大错报风险越低,审计师可接受的检查风险将越高,他们因而只需要付出较少努力程度、实施较少审计程序就可以将审计风险控制在接受的水平以内,他们将会更多地信赖企业的内部控制、实施更少的实质性程序。因此,对于社会信任水平高地区的公司,审计师将更加信任客户并减少审计努力程度,进而可降低审计成本和审计费用(Jha 和 Chen,2015)^[23]。

(2)审计证据的可获性和质量。高社会信任地区居民对诚信问题的高度关注以及此类地区更为发达而密集的社会网络,使得审计师能够更为方便地获取审计证据,审计证据的质量也更高。这一方面是由于,在高社会信任地区,人们更容易合作(La Porta 等,1997)^[6],因此,在审计执行过程中,审计师和客户管理层更容易合作,审计师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时,也更可能获得配合,这将提高审计效率,使审计师在有限时间内获取更充分的审计证据;另一方面是由于,高社会信任水平地区广泛的社会网络使得审计师能够从多个不同渠道获取证据来做出审计判断,由于社会范式和社会网络的作用,审计证据的可靠性也更高。审计证据获取途径和质量的改善,也有助于提高审计效率、降低审计成本(Jha 和 Chen,2015)^[23]。

2. 风险溢价

社会信任水平还会通过影响风险溢价来影响审计定价。其作用路径具体包括:

(1)在低社会信任水平地区,管理层诚信度以及财务报告本身的重大错报风险都更高,这使得审计师即便在实施了充分审计程序后可能也无法将审计风险控制低水平,即审计后的剩余风险较高,此时,他们需要通过收取风险溢价来弥补将来可能的法律损失(民事赔偿、监管部门的罚款)、声誉损失及相关的市场损失。

(2)地区社会信任水平还会影响到审计师的法律责任,这也会进一步影响到审计师收取的风险溢价。在高社会信任地区,不同主体间的合作行为更容易产生,更容易通过协商来解决交易过程中的分歧,而无需诉诸法律,较少发生诉讼(Knack和Keefer,1997)^[8],相应地,审计师的诉讼风险也较低(Jha和Chen,2015)^[23];而在低社会信任水平地区,一方面,相互之间信任的缺乏,使得人们难以通过相互协商来解决分歧,并通过彼此之间的互信来促使分歧的解决,而不得不通过法律诉讼等极端手段来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范式的缺乏,此类地区公司管理层很可能会做出虚假陈述等不诚信行为,而投资者等第三方也容易对管理层及其他信息披露主体的不当行为提起诉讼,从而间接提高审计师的诉讼风险(Jha和Chen,2015)^[23]。在西方,对诉讼风险的担心将使得审计师提高审计费用,以弥补将来的诉讼成本(Jha和Chen,2015)^[23];Simunic和Stein,1996^[36]。在我国,尽管审计师的民事诉讼风险较低,但也要面临监管部门的监管和处罚风险,在受到处罚以后,也会面临客户流失等风险。因此,低社会信任水平地区,潜在法律与监管风险的提高同样会促使审计师通过收取风险溢价来弥补可能的损失。

综上,地区社会信任水平会影响审计师的审计努力程度、审计取证效率及相应的审计成本,并会影响到审计师的法律与监管风险,这两方面都会导致审计师对低社会信任水平地区的客户收取更高审计费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其他条件不变,公司所在省份社会信任水平与审计费用呈负向关系。

四、研究设计

1. 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

(1)模型设定。参考相关文献(Jha和Chen,2015^[23];刘笑霞等,2017^[37];耿艳丽和鲁桂华,2018^[34]),本文在控制地区法治水平(LAW)、公司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合并子公司数(SUBS)、应收款比重(AR)、存货比重(INV)、是否报告亏损(LOSS)、速动比率(QUICK)、盈利水平(ROA)、操控性应计的绝对值(ABSDA)、产权性质(SOE)、股权集中度(CR)、审计师规模(BIG10)、上期审计意见(LagOP)、审计师变更(ACH)、经济发展水平(LnGDP)、年份(Year)、行业(Industry)等因素的条件下,采用模型(1)考察社会信任水平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begin{aligned}
 LnFEE = & \alpha_0 + \alpha_1 TRUST + \alpha_2 LAW + \alpha_3 SIZE + \alpha_4 LEV + \alpha_5 SUBS + \alpha_6 AR \\
 & + \alpha_7 INV + \alpha_8 LOSS + \alpha_9 QUICK + \alpha_{10} ROA + \alpha_{11} ABSDA + \alpha_{12} SOE \\
 & + \alpha_{13} CR + \alpha_{14} BIG10 + \alpha_{15} LagOP + \alpha_{16} ACH + \alpha_{17} LnGDP \\
 & + Industry \& Year + \varepsilon
 \end{aligned} \tag{1}$$

(2)地区社会信任水平的度量。国外学者往往依赖 World Values Surveys (WVS) 系统获取国家、地区社会信任水平数据,进而研究社会信任的影响(La Porta等,1997^[6];Knack和Keefer,1997^[8];Guiso等,2008^[2];Aghion等,2010^[38])。在我国,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22]利用“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就各省份企业守信用状况进行问卷调查,进而确定了各省份的社会信任水平。此后,我国许多学者利用这一调查结果研究地区社会信任。尽管社会信任水平会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但毕竟其只有2000年一次调查数据,距今已较为久远,在这期间我国社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很可能导致地区社会信任水平也发生变化。另外,该调查针对的是“企业是否守信用”,并非直接调查社会信任(即陌生人之间的普遍信任)。因此,本文不采用“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结果

来度量社会信任水平。CGSS 与 WVS 相似,是中国第一个大型社会调查项目,涵盖中国社会发展中不同方面的问题。就社会信任而言,相关问题是“总的来说,您是否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受访者对于“社会上多数人是否值得信任”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表征地区社会信任水平(Guiso 等,2010)^[39]。而且,目前 CGSS 已公开的社会信任调查数据涵盖 2010—2013 年及 2015 年五年,较为连续,被多个学科学者所广泛采用。因此,本文采用 CGSS 调查数据来衡量各省份社会信任水平。考虑到地区社会信任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对于缺少调查数据的 2008—2009 年和 2014 年、2016 年,分别用 2010 年、2013 年、2015 年数据代替。本文采用 TRUST1 和 TRUST2 两种方法度量社会信任,具体定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

符号	含义	具体定义
<i>LnFEE</i>	审计费用	上市公司披露的年报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
<i>TRUST1</i>	社会信任 1	上市公司所在省份的社会信任水平,等于 CGSS 中 a33 的回复中“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人数占该省回复人数总数的比重
<i>TRUST2</i>	社会信任 2	上市公司所在省份的社会信任水平,对于 CGSS 中 a33 问题回复“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说不上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的,分别赋值为 -2、-1、0、1、2,然后,取该省份所有回复的平均值
<i>LAW</i>	地区法治水平	虚拟变量,如果公司所在地的法律环境指数大于分年度样本的中位数,则 $LAW = 1$,否则 $LAW = 0$
<i>SIZE</i>	公司规模	期末资产总额取自然对数
<i>LEV</i>	财务杠杆	资产负债率
<i>SUBS</i>	合并子公司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数的算术平方根
<i>AR</i>	应收账款比重	期末应收账款/期末资产总额
<i>INV</i>	存货比重	期末存货/期末资产总额
<i>LOSS</i>	是否报告亏损	虚拟变量,若公司本年度亏损(净利润为负), $LOSS = 1$;否则, $LOSS = 0$
<i>QUICK</i>	速动比率	期末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i>ROA</i>	盈利性	总资产报酬率
<i>ABSDA</i>	应计盈余管理	用截面修正琼斯模型估计的操控性应计的绝对值。在估计时,先用基本琼斯模型分行业分年度回归,然后将回归得到的系数代入到修正琼斯模型中,从而计算操控性应计。如果该年度某个行业内样本数少于 15,则剔除
<i>SOE</i>	产权性质	虚拟变量,如果公司为国有控股, $SOE = 1$;否则, $SOE = 0$
<i>CR</i>	股权集中度	截止到资产负债表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数)
<i>BIG10</i>	审计师声誉	虚拟变量,如果事务所位于中注协事务所百强综合排名前十位,则 $BIG10 = 1$;否则, $BIG10 = 0$
<i>LagOP</i>	上期审计意见	虚拟变量,若上年财务报表被出具非标意见, $LagOP = 1$;否则, $LagOP = 0$
<i>ACH</i>	审计师变更	虚拟变量,若本年度变更了主审会计师事务所, $ACH = 1$;否则, $ACH = 0$
<i>LnGDP</i>	经济发展水平	上市公司所在省份当年人均 GDP(元)的自然对数
<i>Industry</i>	行业	虚拟变量,上市公司所属中国证监会行业(其中,制造业细分到次类行业)
<i>Year</i>	年份	虚拟变量,所属年份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2.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考虑到2006年前后我国会计、审计准则差异对财务指标一致性及审计师决策的影响,并考虑到本文的模型中涉及上年审计意见,本文以2008—2016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为对象,研究上市公司所在省份的社会信任水平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本文所需的社会信任数据来自于CGSS中A33问题“总的来说,您是否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的调查结果,公司所在省份的法律环境指数和市场化指数来自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①,公司注册地所处省份及其人均GDP、IPO日期、实际控制人数据来自于“WIND资讯金融终端”,合并子公司数据通过年度报告手工搜集获得,事务所变更数据根据CSMAR数据库相关数据并进一步对关事务所发生的合并、更名等事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加以确定,其他数据均来源于CSMAR。初始样本共有21361条公司一年记录,在剔除IPO前记录、金融行业、缺失相关变量数据等样本后,最后剩余17005条公司一年记录用于检验。本文分年度在1%和99%位置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缩尾处理。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1. 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2中可以看出,社会信任指标TRUST1的均值为0.5989,中位数为0.6062;TRUST2的均值为0.3936,中位数仅为0.4026,最大值也只有1.0400,接近于“比较赞同”,因此,总体而言,我国社会信任水平不算高。不过,不同省份之间社会信任程度仍然有较大差异,就TRUST1而言,最低值为0.3651,而最高值为0.8650,表明分别有36.51%和86.50%的受访者赞同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就TRUST2而言,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2700和1.0400,前者低于“谈不上同意不同意”而接近于“不太同意”,而后者高于“比较同意”。这反映出我国不同地区社会信任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最小值	1/4位数	均值	中位数	3/4位数	最大值	标准差
LnFEE	17005	12.1007	13.0170	13.4487	13.3535	13.7642	15.9074	0.6109
TRUST1	17005	0.3651	0.5313	0.5989	0.6062	0.6467	0.8650	0.0862
TRUST2	17005	-0.2700	0.2969	0.3936	0.4026	0.4808	1.0400	0.1640
LAW	17005	0	0	0.4085	0	1	1	0.4916
SIZE	17005	18.5375	21.0356	21.9207	21.7874	22.6566	25.9273	1.2464
LEV	17005	0.0395	0.2841	0.4617	0.4531	0.6221	2.2051	0.2399
SUBS	17005	0.0000	2.0000	3.2932	3.0000	4.1231	13.0384	1.8440
AR	17005	0.0000	0.0257	0.1060	0.0807	0.1584	0.4989	0.0986
INV	17005	0.0000	0.0633	0.1642	0.1232	0.2054	0.8101	0.1556
LOSS	17005	0	0	0.1044	0	0	1	0.3058
QUICK	17005	0.0534	0.6132	1.7743	1.0306	1.8457	23.7336	2.4265
ROA	17005	-0.4359	0.0123	0.0395	0.0357	0.0679	0.3082	0.0623
ABSDA	17005	0.0000	0.0252	0.0824	0.0559	0.1058	0.6771	0.0883
SOE	17005	0	0	0.4404	0	1	1	0.4964

① 法律环境指数只有2008—2014年的数据,2015—2016年的法律环境指数以过去七年的平均值来代替。

续表 2

变量	样本量	最小值	1/4 位数	均值	中位数	3/4 位数	最大值	标准差
<i>CR</i>	17005	0.0866	0.2357	0.3564	0.3366	0.4621	0.7546	0.1501
<i>BIG10</i>	17005	0	0	0.5253	1	1	1	0.4994
<i>LagOP</i>	17005	0	0	0.0419	0	0	1	0.2003
<i>ACH</i>	17005	0	0	0.0938	0	0	1	0.2916
<i>LnGDP</i>	17005	9.1957	10.5206	10.8511	10.9271	11.2120	11.6801	0.4870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2. 相关分析

从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①,无论是 *TRUST1* 还是 *TRUST2*,均与审计费用显著负相关,表明审计师会对社会信任水平高地区的客户收取较低的审计费用,与假说相符;而 *LAW* 与审计费用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好的法律环境会促使审计师提高审计收费。不过,社会信任水平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究竟如何,还需要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就控制变量而言,*SIZE*、*LEV*、*SUBS*、*INV*、*SOE*、*CR*、*BIG10*、*LnGDP* 与审计费用呈显著正相关关系,*AR*、*LOSS*、*QUICK*、*ABSDA*、*LagOP*、*ACH* 与审计费用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此外,无论是 *TRUST1* 还是 *TRUST2*,均与 *BIG10* 呈显著负向关系,表明社会信任水平高的地区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较低。从表 2 中可知,自变量间 Pearson 相关系数绝对值最大的是 *LOSS* 与 *ROA* 的相关系数(-0.624),Spearman 相关系数绝对值最大的为 *QUICK* 与 *LEV* 之间的相关系数(-0.799),均低于一般认为的经验值 0.8;另外,在回归分析时计算发现,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低于经验值 10。故各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3. 多元回归分析

表 3 列示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从表 3 中可以看出,无论用 *TRUST1* 还是 *TRUST2* 度量,公司所在省份的社会信任水平都在 1% 水平与审计定价呈显著负向关系,表明审计师在决定审计收费时会考虑公司所在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并对位于高社会信任地区的客户收取更低的审计费用。假说 H 得到支持。

表 3 多元回归分析:公司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变量	预期符号	<i>TRUST = TRUST1</i>	<i>TRUST = TRUST2</i>
<i>TRUST</i>	-	-0.2717 *** (-3.5146)	-0.1431 *** (-3.5431)
<i>LAW</i>	+	0.0483 *** (2.6532)	0.0487 *** (2.6775)
<i>SIZE</i>	+	0.2966 *** (30.4351)	0.2961 *** (30.4127)
<i>LEV</i>	+	-0.0031 (-0.0882)	-0.0043 (-0.1210)
<i>SUBS</i>	+	0.0774 *** (14.7348)	0.0778 *** (14.8215)
<i>AR</i>	+	0.0161 (0.2313)	0.0165 (0.2365)

① 限于篇幅,本文不列示相关系数矩阵以及进一步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只列示关键变量结果,如有需要,备索。

续表 3

变量	预期符号	<i>TRUST = TRUST1</i>	<i>TRUST = TRUST2</i>
<i>INV</i>	+	-0.2258 *** (-4.3516)	-0.2264 *** (-4.3626)
<i>LOSS</i>	+	0.0560 *** (3.4693)	0.0559 *** (3.4616)
<i>QUICK</i>	-	-0.0110 *** (-4.5277)	-0.0110 *** (-4.5366)
<i>ROA</i>	-	-0.0774 (-0.7179)	-0.0764 (-0.7093)
<i>ABSDA</i>	+	0.0798 ** (2.0634)	0.0809 ** (2.0920)
<i>SOE</i>	-	-0.0874 *** (-5.7595)	-0.0878 *** (-5.7815)
<i>CR</i>	?	0.0288 (0.6105)	0.0293 (0.6210)
<i>BIG10</i>	+	0.1109 *** (9.2404)	0.1119 *** (9.3206)
<i>LagOP</i>	+	0.1758 *** (7.2187)	0.1752 *** (7.2056)
<i>ACH</i>	-	-0.0468 *** (-4.4316)	-0.0479 *** (-4.5416)
<i>LnGDP</i>	+	0.1119 *** (4.3695)	0.1104 *** (4.2830)
<i>Industry & Year</i>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5.6447 *** (17.0132)	5.5634 *** (17.1512)
F		150.6224	150.6832
R ²		0.6222	0.6222
N		17005	17005

注:括号中数字为 *t* 值;依照公司对标准误进行了聚类调整; *、**、*** 分别代表在 10%、5%、1% 水平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就控制变量而言,*LAW* 显著为正,表明在法治水平较高地区的审计收费更高,这与王良成和陈汉文(2010)^[40]、郑军等(2012)^[41]的结果一致,其原因在于,审计师为了控制自身的法律风险,需付出更多的努力,且可能收取风险溢价。*SIZE*、*SUBS*、*LOSS*、*ABSDA*、*BIG10*、*LagOP*、*LnGDP* 的系数显著为正,均符合预期,其中,*SIZE*、*SUBS* 的系数显著为正,是因为规模大、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子公司数多的公司审计成本更高;*LOSS*、*ABSDA*、*LagOP* 显著为正,表明经营风险和财务报表错报风险大的公司审计费用更高;*LnGDP* 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发达地区审计费用更高;*BIG10* 显著为正,表明大

事务所会收取规模溢价。*QUICK*、*INV*、*SOE*、*ACH* 的系数显著为负,其中,*QUICK* 显著为负,表明速动比率越高,审计定价越低,这可能是由于公司的流动性风险更低;*INV* 显著为负,意味着存货较多的公司审计定价反而较低,这与西方的结论相反,但与国内相关文献结论一致(刘运国等,2006^[42];郑军等,2012^[41];赵子夜和周静,2013^[43]),其可能的原因在于,我国注册会计师对于存货可能并未严格地实施监盘程序,因此,存货比重越高,审计成本反而越低(刘运国等,2006)^[42];*SOE* 显著为负,意味着审计师会对国有企业收取更低费用,这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审计的风险相对较低;*ACH* 显著为负,其原因可能在于审计师存在“低价揽客”行为。*LEV*、*AR*、*ROA*、*CR* 则不显著,表明公司财务杠杆、应收账款比重、盈利水平以及股权集中度对审计定价没有显著影响,其中,*LEV* 不显著为正,可能是由于高财务杠杆既意味着公司财务风险较高,也意味着债权人可能发挥治理作用,而适当的杠杆经营也可能提高公司盈利水平;*AR* 不显著为正,可能是由于审计师对于应收账款并未实施严格函证程序;*ROA* 为负但不显著,可能是由于虽然盈利水平高的公司经营风险低,但经营状况好的公司也更愿意支付较高审计费用;*CR* 不显著,可能是由于股权集中度本身具有两面性,其既可能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又可能导致大股东代理问题。

4. 进一步检验:社会信任对审计定价影响的机理

如上所述,社会信任对审计定价的影响路径包括财务报表错报风险、审计证据可获性与质量、法律风险等方面。本文将试图从盈余质量(反映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审计延迟(反映审计努力程度)两个方面来考察社会信任水平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机理^①。本文还将进一步检验地区法治水平、市场化水平对社会信任与审计定价之间关系的影响。

(1) 盈余质量的部分中介作用。本文用截面修正的琼斯模型估计的操控性应计绝对值(*ABSDA*)来衡量盈余质量,进而考察社会信任水平是否通过影响公司盈余质量来影响审计定价,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第(1)列和第(4)列可以看到,在不控制*ABSDA*时,*TRSUST*对审计定价具有显著负向作用;从表4第(2)列和第(5)列可以看到,地区社会信任水平与*ABSDA*呈显著负向关系^②,这意味着,在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地区,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总体较低,盈余质量较高;从表4第(3)列和第(6)列可以看到(实际就是主检验的结果,因为主模型中控制了*ABSDA*),在控制了*ABSDA*后,社会信任水平仍然对审计定价呈显著负向关系。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44],*ABSDA*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而社会信任本身对审计定价亦存在直接影响^③。因此,审计师对位于高社会信任水平省份的公司收取较低的审计费用,部分是由于此类公司盈余质量较高、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较低,他们只需要花费较低成本、实施较少程序,就可以将审计风险控制在接受的水平以内,其为了弥补未来损失而收取的风险溢价也相对较少。而社会信任对审计定价的直接效应,既可能是由于在审计谈判过程中,社会信任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等原因,也可能是由于存在其他的中介因素。

① 本文没有像Jha和Chen(2015)^[23]那样检验社会资本(社会信任)对审计师诉讼风险的影响,是因为我国审计师因审计而面临的民事诉讼风险极低,而行政处罚虽然要比民事诉讼多一些,但由于每年针对事务所的处罚也仅有有限的数起,难以进行有效的检验。

② 在考察社会信任对盈余质量(*ABSDA*)的影响时,控制了如下因素:地区法治水平(*LAW*)、公司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上期是否亏损(*LagLOSS*)、盈利水平(*ROA*)、成长性(*GROWTH*)、股权集中度(*CR*)、审计师规模(*BIG10*)以及年份、行业。

③ 其具体判断过程是:根据表4,第一步,第(1)列和第(4)列中,*TRUST*的系数显著,表明*ABSDA*可能存在中介效应,但不能排除遮掩效应;第二步,第(2)列和第(5)列中*TRUST*的系数、第(3)列和第(6)列中*ABSDA*的系数均显著,表明存在间接效应,无需进行Bootstrap法检验;第三步,第(3)列和第(6)列中*TRUST*的系数显著,表明除了中介效应外,也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也就是说,社会信任会直接影响审计定价);第四步,第(2)列和第(5)列中*TRUST*的系数与第(3)列和第(6)列中*ABSDA*的系数乘积为负,第(3)列和第(6)列*TRUST*的系数亦为负,两者同号,表明*ABSDA*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表 4 进一步检验: 盈余质量 (ABSDA) 的部分中介作用

变量	TRUST = TRUST1			TRUST = TRUST2		
	社会信任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不控制 ABSDA) (1)	社会信任对 ABSDA 的影响 (2)	社会信任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含 ABSDA) (3)	社会信任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不控制 ABSDA) (4)	社会信任对 ABSDA 的影响 (5)	社会信任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含 ABSDA) (6)
TRUST	-0.2728 *** (-3.5281)	-0.0198 ** (-1.9877)	-0.2717 *** (-3.5146)	-0.1434 *** (-3.5495)	-0.0095 * (-1.8271)	-0.1431 *** (-3.5431)
ABSDA			0.0798 ** (2.0634)			0.0809 ** (2.0920)
LAW	0.0478 *** (2.6236)	-0.0020 (-1.3593)	0.0483 *** (2.6532)	0.0481 *** (2.6463)	-0.0020 (-1.3526)	0.0487 *** (2.677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Industry & Year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5.6557 *** (17.0524)	0.3130 *** (16.5905)	5.6447 *** (17.0132)	5.5737 *** (17.1864)	0.3053 *** (17.1076)	5.5634 *** (17.1512)
F	154.1639	37.1778	150.6224	154.2252	37.1660	150.6832
R ²	0.6221	0.1241	0.6222	0.6221	0.1240	0.6222
N	17005	16996	17005	17005	16996	17005

注: 括号中数字为 t 值; 依照公司对标准误进行了聚类调整; *, **, *** 分别代表在 10%、5%、1% 水平显著

资料来源: 本文计算整理

(2) 审计努力程度的部分中介作用。本文用审计延迟 ($LnARL$) 来反映审计努力程度, 进而检验社会信任水平是否通过审计努力程度来影响审计定价, 结果如表 5 所示。 $LnARL$ 等于资产负债表日到审计报告日之间天数加 1 后取自然对数。从表 5 第 (1) 列和第 (4) 列可以看到, 在没有控制 $LnARL$ 时, $TRUST$ 的系数显著为负。从第 (2) 列和第 (5) 列可以看到, 社会信任对审计延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①, 表明在高社会信任地区, 审计师完成审计工作所需的时间更短。一方面, 这可能是由于高社会信任水平地区的公司管理层更注重诚信、会计信息质量更高, 使得审计师只需要实施更少的审计程序来应对审计风险; 另一方面, 也可能是由于在高社会信任地区, 审计师更易获取高质量的审计证据, 从而提高了审计效率。从表 5 第 (3) 列和第 (6) 列可以看到, 在控制了 $LnARL$ 后, $TRUST$ 的系数亦显著为负。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 (2014)^[44], 审计延迟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而社会信任本身对审计定价亦存在直接影响。社会信任对审计定价的负向影响, 部分是由于, 对于高社会信任地区的客户, 审计师可以减少审计努力程度, 这将导致审计定价降低。当然, 社会信任本身对于审计定价也存在直接影响。

① 在考察社会信任对审计延迟的影响时, 控制了如下因素: 地区法治水平 (LAW)、公司规模 ($SIZE$)、财务杠杆 (LEV)、合并子公司数 ($SUBS$)、是否亏损 ($LOSS$)、盈利水平 (ROA)、每股收益是否下降 ($NEWS$)、公司破产概率 (Z)、操控性应计的绝对值 ($ABSDA$)、内部控制质量 (IC)、股权集中度 (CR)、审计师规模 ($BIG10$)、审计意见类型 (OP)、审计师变更 (ACH) 以及年份、行业。其中, $NEWS$ 为每股收益与上年相比是否下降, 若下降, $NEWS = 1$, 否则, $NEWS = 0$; Z 为根据 Edward Altman (1968) 模型计算得出反映公司破产概率大小的指标; IC 为内部控制质量, 等于迪博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加上 1 之后取自然对数; OP 为审计意见类型, 若审计师出具非标意见, 则 $OP = 1$, 否则, $OP = 0$ 。其余变量定义同上。

表 5 进一步检验:审计延迟(LnARL)的部分中介作用

变量	TRUST = TRUST1			TRUST = TRUST2		
	社会信任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不控制 LnARL) (1)	社会信任对 LnARL 的影响(2)	社会信任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含 LnARL) (3)	社会信任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不控制 LnARL) (4)	社会信任对 LnARL 的影响(5)	社会信任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含 LnARL) (6)
TRUST	-0.2728 *** (-3.5281)	-0.1886 *** (-4.6723)	-0.2646 *** (-3.4204)	-0.1434 *** (-3.5495)	-0.1023 *** (-4.6879)	-0.1404 *** (-3.4672)
LnARL			0.0363 ** (2.2807)			0.0361 ** (2.2685)
LAW	0.0478 *** (2.6236)	0.0050 (0.8125)	0.0479 *** (2.6250)	0.0481 *** (2.6463)	0.0045 (0.7413)	0.0482 *** (2.650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Industry & Year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5.6557 *** (17.0524)	4.3487 *** (59.3643)	5.5090 *** (16.2185)	5.5737 *** (17.1864)	4.2847 *** (60.5781)	5.4322 *** (16.3497)
F	154.1639	18.8597	149.4190	154.2252	18.8346	149.4682
R ²	0.6221	0.0631	0.6217	0.6221	0.0633	0.6217
N	17005	16692	16906	17005	16692	16906

注:括号中数字为 t 值;依照公司对标准误进行了聚类调整; *、**、*** 分别代表在 10%、5%、1% 水平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3) 地区法治水平的调节作用。对于法律制度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存在替代关系假说和互补关系假说两种观点(Cline 和 Williamson, 2016)^[12]。依照替代关系假说,在法律制度较差的环境下,社会信任的作用更明显(Guiso 等, 2004^[10]; Aghion 等, 2010^[38]; Wu 等, 2014^[45]; Pevzner 等, 2015^[3]; Chen 等, 2016^[46]; Cline 和 Williamson, 2016^[12]); 而依照互补关系假说,在法律制度较好的情况下,社会信任的作用更为明显(黄宏斌, 2012^[15]; 刘宝华等, 2016^[17])。为了解不同法治环境下,社会信任对审计定价影响的差异,本文依照 LAW 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从表 6 可以发现,只有在法治环境较差地区, TRUST 才对审计定价具有显著负向作用^①。这表明,社会信任对审计定价的负向作用仅存在于法治水平较弱地区。由此可见,就审计定价而言,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与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信任之间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在法律制度较差的地区,社会信任更为重要。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是当由于立法原因导致正式法律制度不能为契约执行提供有效保证,或者虽然有相关法律制度但执法机制较弱,人们难以有效惩罚交易对手的不诚信行为时,社会信任更加重要(Guiso 等, 2004^[10]; Carlin 等, 2009^[47]; Ang 等, 2015^[48]; Pevzner 等, 2015^[3]); 反过来,在社会信任水平较低的地方,法律制度或者执法机制也将更为重要,原因在于,由于彼此之间缺乏相互信任,交易主体只能通过正式规则和规范,采用谈判、诉讼、强制执行等手段来保证合作和交易有序进行(福山, 2016)^[7]。因此,社会信任与法律制度之间呈现出一种相互替代的关系。在法治水平较

① 如果不用分组检验,而采用加入交互项对全样本进行检验,只有用 TRUST1 度量社会信任水平时,交互项 TRUST × LAW 的系数才在 10% 水平显著为正,因此,仅有较弱的证据表明法治水平会弱化社会信任对审计定价的影响;但在两种度量下, TRUST 的系数均在 1% 水平显著为负,表明在法治较差地区,社会信任与审计定价呈显著负向关系,而 LAW 与 TRUST × LAW 系数之和均为负但不显著,表明在法治水平较高地区,社会信任与审计定价之间没有显著关联。总的来说,与分组检验结果一致。

高地区,管理层的失信行为将会面临法律严厉惩罚,因此,公司将更少发生欺诈行为、盈余质量更高,审计师的风险相应较低,社会信任的作用也因此被降低;而在法治水平较低的地区,管理层失信行为的法律成本较低,审计师审计风险较高,他们在签订和执行审计契约的过程中,会更加关注该地区社会信任水平,来确定管理层是否值得信赖,进而做出审计投入和补偿等决策。二是从审计师法律与监管风险角度而言,地区法治水平与审计定价之间是正向关系,因为审计师在面对较为严格的法律制度或执法机制时,将会提高审计努力程度来降低审计风险,并可能会对实施审计程序后的剩余风险收取较高风险溢价。在法治水平较低的地区,审计师的法律风险(在我国主要表现为监管和处罚风险)较低,因而不会导致审计定价显著提高,而社会信任的负向作用将会较为明显;而在法治水平较高地区,较高的法律风险将促使审计师收取更高审计费用,以弥补审计成本提高或/和风险溢价,此时,社会信任的负向作用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

表 6 进一步检验:不同法治水平下社会信任对审计定价影响的差异

变量	TRUST = TRUST1		TRUST = TRUST2	
	法治环境差	法治环境好	法治环境差	法治环境好
TRUST	-0.3618*** (-4.1629)	0.0302 (0.2121)	-0.1749*** (-3.8876)	0.0009 (0.011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Industry & Year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6.1611*** (15.6126)	4.8882*** (8.8972)	6.0251*** (15.7420)	4.9224*** (9.0049)
F	88.1793	78.0693	88.3049	78.0831
R ²	0.5938	0.6623	0.5935	0.6623
N	10058	6947	10058	6947

注:括号中数字为t值;依照公司对标准误进行了聚类调整;*、**、***分别代表在10%、5%、1%水平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4)地区市场化水平的调节作用。除了法治水平外,地区市场化水平与社会信任之间也可能存在相互影响^①。本文根据市场化指数的分年度中位数将样本分为市场化水平高和市场化水平低两个子样本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从表7可以发现,只有在市场化水平较低样本中,社会信任才对审计定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因此,市场化水平与社会信任之间同样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社会信任更为重要。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是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市场资源配置、企业相关交易行为等均较为透明、公正,会计信息质量相对较高,审计师的审计风险相对较低,此外,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各种产品和要素市场、基础设施较为发达,这也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降低审计师的审计风险,因而,审计师在审计定价决策过程中较少考虑该地区的社会信任程度。二是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管理层的失信行为成本将会提高,因为市场将根据企业真实的质量来配置资源,这意味着,审计师受到管理层欺骗的可能性较低,审计师对通过评价所在地区的社会信任程度来评估审计风险的依赖性将下降,从而降低社会信任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程度。三是在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法律制度等正式制度也较为健全,这也会导致社会信任的重要性降低。

① 作为稳健性检验,本文也在主检验模型以及相关进一步检验中加入市场化指数,结果均保持不变,但市场化指数本身对审计定价没有显著影响。之所以本文没有将其作为控制变量,是由于在考虑审计师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时(下文稳健性检验2),如果控制市场化指数,将导致模型不能输出F值。

表 7 进一步检验:不同市场化水平下社会信任对审计定价影响的差异

变量	TRUST = TRUST1		TRUST = TRUST2	
	市场化水平低	市场化水平高	市场化水平低	市场化水平高
TRUST	-0.3777*** (-4.1353)	-0.1001 (-0.9283)	-0.1751*** (-3.6668)	-0.0771 (-1.1818)
LAW	0.0539* (1.6904)	0.0137 (0.6345)	0.0577* (1.8087)	0.0161 (0.739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Industry & Year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5.8805*** (15.3508)	4.4518*** (6.3729)	5.7519*** (15.5101)	4.4617*** (6.3477)
F	88.1726	76.2030	87.9005	76.2037
R ²	0.6221	0.6263	0.6219	0.6264
N	9436	7569	9436	7569

注:括号中数字为t值;依照公司对标准误进行了聚类调整;*、**、***分别代表在10%、5%、1%水平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5. 稳健性检验

(1)考虑社会信任水平的内生性。一个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基本稳定,而不会发生太大变化(Goergen等,2013^[49];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22]),在理论上,审计定价也不可能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因此,不大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但由于本文中社会信任水平是根据CGSS调查数据来度量的,可能存在测量误差。此外,尽管本文已经控制了可能影响审计定价的主要因素,但仍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二阶段回归方法来缓解测量误差以及遗漏变量原因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参考相关文献(Guiso等,2009^[11];Chen等,2016^[46];李明辉,2019^[28]),本文用公司所在省份的民族多样性(MINORITY,即有多少个民族将本省份作为主要聚居地)作为工具变量^①,内生性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表明,MINORITY是合适的工具变量^②;从表8可以看出,在用工具变量二阶段回归缓解内生性问题后,TRUST仍然与审计定价在5%水平呈显著负向关系。此外,本文还参考刘凤委等(2009)^[19]、曹春方等(2015)^[50]的方法,先以社会信任水平作为因变量,以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情况和公民教育程度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求出残差,再将残差作为新的解释变量(即剔除了经济、交通、教育影响后的社会信任水平),检验其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结果同样与主检验一致(表略,备索)。因此,在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后,社会信任水平仍然与审计定价呈显著负向关系。

表 8 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二阶段回归结果

变量	TRUST = TRUST1	TRUST = TRUST2
TRUST	-1.4194** (-2.1326)	-0.9207** (-2.0929)
LAW	0.0919*** (2.8858)	0.1068*** (2.764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Industry & Year	已控制	已控制

① 民族数据由国家民委门户网站“少数民族概况”(http://www.seac.gov.cn/col/col107/index.html)整理而成。

② 在用TRUST1(TRUST2)度量时,Hausman检验卡方值为34.89(36.82),在1%水平拒绝外生性假设;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表明,最小特征根是446.15(293.389),大于零界值8.96,故可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

续表 8

变量	$TRUST = TRUST1$	$TRUST = TRUST2$
常数项	7.3249 *** (7.1249)	7.2839 *** (7.0677)
Wald chi ²	5985.1271	5874.9783
R ²	0.6054	0.5948
N	16984	16984

注:括号中数字为 *t* 值;依照公司对标准误进行了聚类调整; *、**、*** 分别代表在 10%、5%、1% 水平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2)考虑审计师所在地区社会信任的影响。审计师所在地区社会信任也可能影响审计定价,且审计师所在地区社会信任与客户所在地区社会信任的影响可能会形成叠加(Jha 和 Chen, 2015)^[23]。Jha 和 Chen(2015)^[23]发现,审计师所在县社会资本和客户所在县社会资本都会负向影响审计费用,但他们认为,多数公司与审计师距离都很近,他们往往位于同一个县或者相邻的社会资本接近的县,因此,难以确定究竟是哪一个社会资本的影响更重要。Chen 等(2018)^[27]则指出,在我国,公司与审计师的平均距离超过了 142 千米,因而有机会来识别客户所在地区社会信任和审计师所在地区社会信任的影响。为了区分审计师和公司所在地区社会信任的影响,参考 Chen 等(2018)^[27]的做法,本文进行了如下检验:其一,在模型(1)中加入事务所总部所在地的社会信任水平(AUDTRUST),以分别考察两种社会信任的影响,结果如表 9 第(1)列和第(2)列所示。可以看到,公司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和事务所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均与审计费用呈显著负向关系,这与 Jha 和 Chen(2015)^[23]的结果一致。其二,仅对事务所总部在北京的样本进行检验(因我国多数事务所的总部在北京),以便在控制审计师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的基础上考察公司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结果如表 9 第(3)列和第(4)列所示。可以看到,TRUST 仍显著为负,这表明,在事务所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公司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仍然会显著负向影响审计定价。其三,仅对总部在广东的公司进行检验(因广东地区上市公司数量最多),以便在控制公司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的基础上考察事务所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结果如表 9 第(5)列和第(6)列所示。可以看到,在公司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既定的情况下,事务所总部所在地区与审计定价呈显著负向关系,这表明,来自于高社会信任地区的事务所也会对客户收取较低的审计费用。其原因,或许在于高社会信任地区的审计师对其他人更为信任,因此,在审计契约的签订过程中相关交易费用更低,且能够更有效地实施审计。但其机理究竟如何,有待进一步研究。综合以上结果,审计师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确实会负向影响审计定价,但即便在控制这一因素的基础上,公司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仍对审计定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表 9 稳健性检验:考虑事务所总部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

变量	同时考察公司和事务所 总部所在地社会信任的影响		仅对总部在北京的 事务所的客户进行检验		仅对总部 在广东的公司进行检验	
	TRUST1 (1)	TRUST2 (2)	TRUST1 (3)	TRUST2 (4)	TRUST1 (5)	TRUST2 (6)
TRUST	-0.2247 *** (-2.7850)	-0.1241 *** (-2.9653)	-0.2437 ** (-2.5054)	-0.1396 *** (-2.7875)		
AUDTRUST	-0.2646 *** (-2.5934)	-0.1188 ** (-2.0259)			-0.6298 *** (-3.2219)	-0.3309 *** (-2.9223)

注:括号中数字为 *t* 值;依照公司对标准误进行了聚类调整; *、**、*** 分别代表在 10%、5%、1% 水平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3)用虚拟变量(是否大于等于分年度样本中位数)度量公司所在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结果仍然发现(表略),公司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与审计定价呈显著负向关系。

(4)用资产费用率(审计费用/资产总额的平方根)度量审计定价。我国上市公司审计费用一定程度上存在“固化”现象,往往会连续数年保持不变,这不仅使得难以采用一阶差分方法检验社会信任水平的变化对审计费用变化的影响,而且,由于公司规模发生变化,单纯用审计费用并不能真正反映审计定价,而资产费用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一问题。检验结果表明(表略),地区社会信任水平与审计费率呈显著负向关系。

(5)仅对新客户进行检验。随着审计任期的延长,审计师与客户之间的了解逐渐增多,逐渐成为“熟人”,私人信任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取代社会信任,社会信任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可能会降低,加之审计费用较为普遍的“固化”现象,审计师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关注未必能够马上在审计定价上体现出来。而对新客户而言,审计师与客户管理层之间某种程度上还属于“陌生人”,此时,社会信任会较为重要。并且,在初次确定业务关系时,审计师往往要在对客户进行初步了解的基础上就审计定价等问题与客户进行讨价还价,其对社会信任水平相关风险的考量更可能在审计定价谈判中体现出来。因此,对新客户进行检验,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地了解社会信任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本文对审计任期在一年以内的样本进行检验后仍然发现(表略),社会信任水平对审计定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6)为避免缺失调查结果年份、社会信任水平度量不准确的问题,本文仅对2010—2013年、2015年有调查结果的五年数据进行检验,结果与上文一致(表略)。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因此,本文没有进行差分方法考察社会信任水平变化对审计定价变化的影响。

六、结论与讨论

1.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CGSS2010—2013年及2015年关于社会信任问题的调查数据衡量社会信任水平,进而考察了公司所在省份的社会信任水平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公司特质、地区发展水平等因素后,公司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与审计定价呈显著负向关系,并且,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及审计师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这表明,在我国,总体社会信任水平相对较低且不同地区之间不够平衡,由于审计师在面对客户时处于弱势地位,而与公司虚假陈述相关的法律制度、公司治理机制亦不足以为审计师的勤勉履职行为提供有效保护,因此,审计师同样会关注社会信任问题,并会在审计定价决策中根据客户所在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来确定收费,以应对低社会信任环境下相关风险。进一步研究表明,盈余质量和审计延迟对于社会信任水平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社会信任水平之所以能够负向影响审计定价,部分是由于在社会信任水平高地区,公司财务报表质量更高,审计师的审计风险更低,他们只需要花费较少的时间来完成审计,审计成本及剩余风险均较低。研究还发现,在法治水平较低、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更为明显。这表明,在法律制度和执法机制较弱、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社会信任对于契约的建立和实施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我国相关法律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时,加强社会治理、提高社会信任水平非常重要。

本文从审计定价的角度提供了社会信任微观经济后果的经验证据。社会信任对审计定价的负向作用表明,社会信任能够促进审计契约过程中交易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对客户而言,审计定价降低意味着可以节约费用;对审计师而言,审计定价降低来自于审计成本和法律风险降低、审计效

率提高,这对于审计师而言,同样是一件好事。因此,无论是对被审计单位还是对审计师而言,较高社会信任水平所带来的审计定价降低,都意味着交易成本降低、经济福利提高。社会诚信与社会信任紧密相连,如果多数社会成员都讲诚信,则社会成员之间的共同信任(社会信任)水平将会极大提高。对于政府而言,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包括建立对失信行为的惩戒机制,以促进社会成员诚信水平的提高,进而增进社会成员之间的共同信任。近年来,我国政府将“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项重要内容,先后颁布了《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7]17号)、《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体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号)等文件,以期加快推进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社会诚信水平的提高。本文的结果表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为我国加强社会诚信建设的必要性和有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

2. 本文的不足

本文不足主要包括:(1)社会信任的度量。本文采用CGSS调查数据来度量公司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尽管CGSS是一个较为权威的调查,但由于调查对象选择等原因,调查结果仍存在不能准确反映相关地区社会信任水平的可能。(2)同一省份内部不同地区(城市)之间社会信任的差异。即便在同一省份内部,由于历史、语言、宗族、地理等原因,不同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仍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但由于CGSS的调查是在省一级进行的,因此,本文无法进一步在城市层面上进行检验。此外,尽管本文采用工具变量二阶段回归方法来缓解内生性问题,但内生性的影响仍可能存在。

参考文献

- [1] Gambetta, D. Can We Trust Trust? [A]. In: Gambetta, Diego (ed.)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C].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0.
- [2] Guiso, L., P. Sapienza, and L. Zingales. Trusting the Stock Market [J]. *Journal of Finance*, 2008, 63, (6): 2557 - 2600.
- [3] Pevzner, M., F. Xie, and X. Xin. When Firms Talk, Do Investors Listen? The Role of Trust in Stock Market Reactions to Corporate Earnings Announcement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5, 117, (1): 190 - 223.
- [4] Hilary, G., and S. Huang. Trust and Contracting [R/OL]. INSEAD Working Paper No. 2015/42/ACC. <https://ssrn.com/abstract=2604974>, 2015 - 05 - 11.
- [5] Williamson, O. E. Calculativeness, Trust,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J]. *The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93, 36, (1): 453 - 486.
- [6] La Porta, R., F. Lopez-De-Silanes, A. Shleifer, and R. W. Vishny. Trust in Large Organization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 87, (2): 333 - 338.
- [7] 弗朗西斯·福山. 信任: 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M]. 郭华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 [8] Knack, S., and P. Keefer.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112, (4): 1251 - 1288.
- [9] Zak, P. J., and S. Knack. Trust and Growth [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1, 111, (470): 295 - 321.
- [10] Guiso, L., P. Sapienza, and L. Zingales.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 (3): 526 - 556.
- [11] Guiso, L., P. Sapienza, and L. Zingales. Cultural Biases in Economic Exchange?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124, (3): 1095 - 1131.
- [12] Cline, B. N., and C. R. Williamson. Trust and the Regulation of Corporate Self-Dealing [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6, 41, (12): 572 - 590.
- [13] Jha, A. Financial Reports and Social Capital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9, 155, (2): 567 - 596.
- [14] 雷宇. 信任、制度环境与盈余信息含量 [J]. 武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1, (5): 55 - 61.
- [15] 黄宏斌. 法律制度、社会信任与会计舞弊 [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2012, (2): 62 - 68.
- [16] 张兴亮, 夏成才. 社会信任、债务契约履行与会计信息治理效应 [J]. 天津: 现代财经, 2016, (4): 80 - 91.

- [17] 刘宝华,罗宏,周微,杨行. 社会信任与股价崩盘风险[J]. 北京:财贸经济,2016,(9):53-66.
- [18] Hasan, I., C. (S.) Hoi, Q. Wu, and H. Zhang. Social Capital and Debt Contracting: Evidence from Bank Loans and Public Bond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17, 52, (3): 1017-1047.
- [19] 刘凤委,李琳,薛云奎. 信任、交易成本与商业信用模式[J]. 北京:经济研究,2009,(8):60-72.
- [20] 戴亦一,潘越,陈静. 双重保荐声誉、社会诚信与 IPO 过会[J]. 北京:金融研究,2014,(6):146-161.
- [21] 张维迎. 产权、政府与信誉[M]. 上海:三联书店,2001.
- [22] 张维迎,柯荣住. 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 北京:经济研究,2002,(10):59-70.
- [23] Jha, A., and Y. Chen. Audit Fees and Social Capital[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5, 90, (2): 611-639.
- [24]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25] 李伟民,梁玉成. 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J]. 北京:社会学研究,2002,(3):11-22.
- [26] 李涛,黄纯纯,何兴强,周开国. 什么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J]. 北京:经济研究, 2008,(1):137-152.
- [27] Chen, D., L. Li, X. Liu, and G. J. Lobo. Social Trust and Auditor Reporting Conservatism[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8, 153, (4): 1083-1108.
- [28] 李明辉. 社会信任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基于 CGSS 调查数据的研究[J]. 北京:审计研究,2019,(1):110-119.
- [29] Nanda, D., and P. Wysocki. Trust, External Capital and Financial Transparency[R].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Miami School of Business, October, 2013.
- [30] 雷光勇,邱保印,王文忠. 社会信任、审计师选择与企业投资效率[J]. 北京:审计研究,2014,(4):72-80.
- [31] Chami, R., and C. Fullenkamp. Trust and Efficiency[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2, 26, (9): 1785-1809.
- [32] 武恒光,郑方松. 审计质量、社会信任和并购支付方式[J]. 北京:审计研究,2017,(3):82-89.
- [33] 姜付秀,石贝贝,李行天. “诚信”的企业诚信吗?——基于盈余管理的经验证据[J]. 北京:会计研究,2015,(8):24-31.
- [34] 耿艳丽,鲁桂华. 企业诚信影响审计收费吗?——基于纳税诚信的经验研究[J]. 北京:审计研究,2018,(1):68-77.
- [35] Garrett, J., R. Hoi, and D. F. Prawitt. Trust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4, 52, (5): 1087-1125.
- [36] Simunic, D. A., and M. T. Stein. The Impact of Litigation Risk on Audit Pricing: A Review of the Economics and the Evidence [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1996, 15, (Supplement): 119-134.
- [37] 刘笑霞,李明辉,孙蕾. 媒体负面报道、审计定价与审计延迟[J]. 北京:会计研究,2017,(4):88-94
- [38] Aghion, P., Y. Algan, P. Cahuc, and A. Shleifer. Regulation and Distrust[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0, 125, (3): 1015-1049.
- [39] Guiso, L., P. Sapienza, and L. Zingales. Civic Capital as the Missing Link[R/OL]. NBER Working Paper 15845, <http://www.nber.org/papers/w15845>, 2010.
- [40] 王良成,陈汉文. 法律环境、事务所规模与审计定价[J]. 北京:财贸经济,2010,(4):69-75.
- [41] 郑军,林钟高,彭琳. 法制环境、政治关系、审计师选择与审计定价——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香港: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12,(1):1-55.
- [42] 刘运国,麦剑青,魏哲妍. 审计费用与盈余管理实证分析[J]. 北京:审计研究,2006,(2):74-80.
- [43] 赵子夜,周静. 行业专家型独立董事、业务复杂度和审计费用[J]. 香港: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13,(1):39-79.
- [44] 温忠麟,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 北京:心理科学进展,2014,(5):731-745.
- [45] Wu, W., M. Firth, and O. M. Rui. Trust and the Provision of Trade Credit[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4, 39, (1): 146-159.
- [46] Chen, D., X. Liu, and C. Wang. Social Trust and Bank Loan Financing: Evidence from China [J]. *Abacus*, 2016, 52, (3): 374-403.
- [47] Carlin, B. I., F. Dorobantu, and S. Viswanathan. Public Trust, the Law, and Financial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9, 92, (3): 321-341.
- [48] Ang, J. S., Y. Cheng, and C. Wu. Trust, Investment, and Business Contracting[J].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15, 50, (3): 569-595.
- [49] Goergen, M., S. Chahine, C. Brewster, and G. Wood. Trust, Owner Rights, Employee Rights and Firm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2013, 40, (5/6): 589-619.
- [50] 曹春方,周大伟,吴澄澄. 信任环境、公司治理与民营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J]. 北京:世界经济,2015,(5):125-147.

Social Trust and Audit Pricing: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CGSS Survey Data

LIU Xiao-xia¹, LI Ming-hui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94,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Social trust can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and promote cooperative activities. Audit contract is a trust-sensitive contract. There is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auditor and management of client. If the management does not provide auditor accurate and complete information required for the audit, or even deliberately conceals relevant financial accounting issues, the risk of the auditor will be greatly increased. Auditors themselves cannot punish the behavior of the clients, except issuing modified audit opinions, increasing audit fees, or resigning from the risky clients. In this sense, mutual trust is key for the establishment, maintenance and implementation of audit contractual. Jha and Chen(2015) find that firms headquartered in U. S. counties with high social capital pay lower audit fees. In China, however, the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example, in China, trust mainly exists among acquaintances, and the level of social trust between strangers is generally low. The buyer audit market makes auditors in a weak position in front of clients. While relevant legal system can hardly provide effective protection for auditors. It's still unknown whether social trust can affect China's auditors' audit pricing decisions.

Using the survey data of CGSS and the data of Chinese A-share non-financial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8 to 2016,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social trust on audit pricing.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audit pricing and social trust of the province where the client is located. Above result demonstrates that in China, auditors do care the level of social trust in the client's region and adjust their audit fees accordingly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findings of Jha and Chen(2015). This paper further examines the channels by which social trust affects audit fe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ccrual earnings quality and auditor's effort(measured by audit delay).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both accrual earnings quality and audit effort are lower when social trust is high and that they are both partial mediator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both regional rule of law and marketization level can weaken the negative effect of social trust on audit pricing, and that the role of social trust in reducing audit pricing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regions with a lower level of the rule of law/ marketization. Therefore, social trust is a substitute of legal system/ marketization level.

This paper makes three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1)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regional social trust level on audit pricing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thus expanding the litera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trust and auditor behavior. It also further enriches the literature on the mi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social trust. (2) This paper further attempts to provide insight into why audit fees are lower in a high social-trust environment, and finds that both earnings quality and auditor effort have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s. It help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nels by which social trust affects audit behavior. (3)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egional rule of law, and finds that social trust has a more pronounced effect on audit pricing in regions with weak rule of law. Such a result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of the altern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l institution(social trust) and formal legal syst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dit pricing. It also helps to understand why auditors care the social trust level in China where the rule of law is still to be improved. This paper also finds that the effect of social trust on audit pricing is significant only in the regions with lower level of marketization and it'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ization level and social trust.

Key Words: social trust; audit pricing; audit risk; audit effort

JEL Classification: M42, M14, M41

DOI:10.19616/j.cnki.bmj.2019.10.009

(责任编辑:弘毅)